



明清史学术文库

近代的初曙

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

下

高翔 著

故宫出版社

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



明清史学术文库

近代的初曙

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

下

高翔 著

故宫出版社

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近代的初曙：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 / 高翔著.
— 北京：故宫出版社，2013.6
(明清史学术文库)
ISBN 978-7-5134-0421-1

I. ①近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社会发展-影响-观念-研究-
中国-18 世纪 IV. ①K249.07②B03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31094 号

近代的初曙：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

著 者：高 翔

责任编辑：冯印淙 艾珊歌

封面设计：李 猛

出版发行：故宫出版社

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 4 号 邮编：100009

电话：010-85007808 010-85007816 传真：010-65129479

网址：www.culturefc.cn 邮箱：ggcb@culturefc.cn

制 版：保定市万方数据处理有限公司

印 刷：保定市中国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：40.5

字 数：515 千字

版 次：2013 年 6 月第 1 版

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~3000 册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34-0421-1

定 价：66.00 元

第三章 学术观念的多元化 趋势（下）

第三节 主流学术内部的变革

独立思考的风气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反传统思潮在 18 世纪的知识界确实风行一时，受这一观念变革冲击最大的毫无疑问是居于正统地位的理学。

尽管在清朝意识形态领域，理学所宣扬的纲常伦理一直居于主导地位。但在知识界，从 18 世纪初起，理学的学术影响就随着实证学风的兴起逐渐走向衰落。到乾隆时期，汉学大炽，批判理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，理学，特别是程朱理学在学术研究领域的独尊地位便走向终结。要准确了解清代理学衰落的原因，我认为大致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予以考察：

一是清初理学自身的学术局限。清初理学笃于主敬而殊少发明，勤于践行而疏于立言。这一朴实学风显然是对晚明空谈自是，信口游谈陋习的反动，在短期内的确能够起到“纯洁”“正学”之作用，也予人以耳目一新之感，有助于凝聚信徒，扩大影响。然对理学来说，主敬躬行诚然重要，但穷理讲论也必不可少。学术少发明，必缺活力；少讲论，必乏信徒。长此以往，学术发展的内在潜力必然陷于枯竭。故到康熙后期，特别是进入 18 世纪以

后，随着理学大家、道学名臣纷纷凋谢，昔日人才济济的理学界便呈后继乏人之势，理学随之趋于萎靡。

二是政治背景的改变。清初理学之所以在康熙时能得到复兴，除了当时的理学家能以主敬、践行为特色，一改晚明学术陋习外，还在于它争取到了清朝皇帝的支持，而当时的清朝也需要通过扶持理学达到重建社会伦理秩序，进而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。即“至治之世，不以法令为亟，而以教化为先。”“盖法令禁于一时，而教化维于可久。徒恃法令，而教化不先，是舍本而务末也”¹。要推行教化，就必须借助具有系统哲学和伦理内涵的理学学说。而康熙帝本身又是一位具有浓厚理论兴趣的皇帝，“孜孜求治，留心学问”，“命儒臣撰为讲义，务使阐发义理，裨益政治；同诸经史进讲，经历寒暑，罔敢间辍”，明确宣布清廷将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，“究先圣之微言，则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，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，庶几进于唐、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”²。正是这一现实政治需要，使理学的复兴具有了客观必然性。降至雍乾时期，清朝政权早已巩固，社会秩序早已稳定，对清朝统治者来说，理学虽系维系人心所必不可少，但已经不像康熙前期那样急不可待，不可或缺。和康熙帝比起来，雍正、乾隆二帝的理论修养要平庸得多，对理学的兴趣也要小得多。对作为教化工具的理学，他们虽然对其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仍坚定维护，对其宣扬的纲常伦理仍竭力鼓吹，但对作为学术研究的理学，没有太多的兴趣，远不能像康熙帝那样潜心钻研，“殊觉义理无穷，乐此不倦。”³雍正、乾隆二帝自身理学素养的欠缺，严重危害着理学的权威地位。像雍正帝置理学主敬学说于不顾，大搞三教合一，公

1 《清圣祖实录》卷三四，康熙九年十月癸巳，中华书局，1985 年。

2 《康熙起居注》第 1 册，第 340 页，中华书局，1984 年。

3 《康熙起居注》第 1 册，第 80 页，中华书局，1984 年。

然宣称自己“向来三教并重，视为一体”¹。不仅如此，雍正六年（1728年），他还罗织罪名，对李光地门生、理学名儒杨名时进行惩处、责辱。时杨名时任云南巡抚，雍正帝令总督鄂尔泰将其“罪行”通行晓谕，“使滇省之人共知杨名时平素之诈伪巧饰，于伊奉旨起身来京之时相率而践辱之。”²雍正帝责辱杨名时的真实目的是打击科甲官僚，特别是理学官僚中的好名习气，所谓“此辈假道学，实系真光棍，诚为名教罪人，国家蛊毒。若不歼其渠魁，恶习万不能革”³。对杨名时的惩处，在客观上动摇了理学在官僚队伍中的地位，因为杨系理学和科甲官僚的领袖人物，“即如朱轼、张廷玉现任大学士，莫不因伊前辈，慑服尊重”⁴。继雍正之后的乾隆帝虽然表示：“典章制度，汉唐诸儒有所传述，考据固不可废，而经术之精微，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。”⁵但自己的主要兴趣在作诗，在文化建设上好大喜功，热衷于搞大工程，而对相对枯燥的理学义理却没有太多兴趣，一些官僚美其名曰“以实学倡天下士”⁶。皇帝对理学兴趣减小，在客观上会深刻影响当时的社会政治，特别是士林风气，使理学发展深受其害，昭槤对此颇有感受。他说：“自于（敏中）、和（珅）当权后，朝士习为奔竞，弃置正道。黠者诟置正人，以文已过，迂者株守考订，訾议宋儒，遂将濂、洛、关、闽之书，束之高阁，无读之者。余尝购求薛文清《读书记》及胡居仁《居业录》诸书于书坊中，贾者云：‘近二十余年，坊中久不贮此种书，恐其无人市易，徒伤赀本耳！’伤哉

1 《雍正朝汉文朱批汇编》第1册，第525～526页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9～1990年。

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：《雍正起居注》六年正月二十三日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。

3 《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》第11册，第860页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9～1990年。

4 《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》第11册，第860页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9～1990年。

5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一二八，乾隆五年十月己酉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。

6 王鸣盛：《福建乡试录序》，《西庄始存稿》卷一六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，集部第1434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。

是言，主文衡者可不省欤？”¹又云：“自乾隆中，傅（恒）、和（珅）二相擅权，正人与之梗者，多置九卿闲曹，终身不迁，所超擢者，皆急功近名之士，故习理学者日少，至书贾不售理学诸书。”²程晋芳则感叹：清初海内士大夫以宗阳明为耻，“而四十年来，并程朱之脉，亦无有续者，此则非愚意料所及也”³。

三是汉学兴起以及思想解放趋势对理学的严重冲击，对此，笔者在前面已作叙述，这里从略。

任何一种学术流派，当其遇到危机之时，就要积极寻求变革。18 世纪的中国，求实之风波靡学界。在这个观点纷繁，歧见迭出，知识聚集，方法更新的年代，昔日以讲学论道著称的理学界，无论是陆王学术还是程朱学术，面对汹涌而来的观念冲击，都遇到了探索学术发展道路的问题。是时理学学风渐趋朴实，论证愈见周详。显然，这在治学方法上受到了考据风气的影响。一些理学的信奉者试图通过对理学内部进行学术改革，以挽救其衰落命运。注意经学，以理学的立场研究、解释儒家经典，从儒家经典汲取学术营养成为 18 世纪理学名家中带普遍意义的学术选择。这一过程从 17 世纪末就已非常清楚地显现出来。比较典型的如，康熙三十年（1691 年），年仅 24 岁的方苞⁴游京师，与万斯同交往。

1 昭槁：《书贾语》，《嘯亭杂录》卷一〇，中华书局，1980 年。

2 昭槁：《理学盛衰》，《嘯亭续录》卷四，中华书局，1980 年。

3 程晋芳：《正学论三》，《勉行堂文集》卷一，嘉庆庚辰本堂藏版。

4 方苞，生于康熙七年（1668 年），卒于乾隆十四年（1749 年）（《清史列传》卷一九，《方苞传》谓方苞卒于乾隆十六年，有误。据苏惇元辑《方苞年谱》，方苞卒于乾隆十四年八月十八日），字凤九，一字灵皋，号望溪，安徽桐城人。康熙四十五年进士，以母病，未预殿试。五十年，以《南山集》案牵连，下狱。五十二年，出狱，令隶汉军旗。以学问入直南书房。雍正帝即位初，赦归原籍。此后，历任侍讲、内阁学士、礼部侍郎等职。乾隆四年，因泄漏条奏事件，“假公济私”，落职，令在三礼馆修书。乾隆七年以侍讲衔休致。在清代士林阶层，方苞素以学问著称。李光地尝谓其“当与韩、欧争等列，北宋以后无此人也”（《雷铉：方苞行状》，《碑传集》卷二五）。在清代知识发展史上，方苞的主要贡献有三：一是为文讲义法，开创了桐

万斯同劝其“勿读无益之书，勿为无益之文”¹。万斯同所谓“益”者，盖指“明道”而言，故季野又对方苞云：“唐、宋号为文家者八人：其于道粗有明者，韩愈氏而止耳；其余则资学者以爱玩而已，于世非果有益也。”²正是受季野之影响，方苞“辍古文之学，一意求经义焉”³。方苞之学，以理学为宗，但不事空谈，以经为根底，“不惟解经之文，凡笔墨所涉，莫不有六籍之精华寓焉”⁴。顾琮谓其文章，“乃探索于经书，与宅心之实，与人之忠，随所触而流焉者也，故生平无不关于道教之文”⁵。方苞重视穷理的意义，提出：“欲体道以得其身，非极学问思辨之功，所谓笃行者，终无本统。”⁶然他反对脱离经典空言义理，认为穷理必本于经，治理学必须以经书为本，“不出于圣人之经，皆非学也”⁷。并身体力行，以为后学之典范。晚年治《仪礼》，“晨兴，必端坐诵经文，设为身履其地，即其事，而求昔圣人所以制为此礼，设为此仪之意，虽卧病犹仰而思焉。”⁸在治学方法和途径上，和清初理学偏重主敬、践行之风气已经具有了明显区别。18世纪，方苞在理学界颇负盛名，乾隆十一年（1746年），年逾半百的江苏学政尹会一竟和其子嘉铨一道受业其门下。言清代理学者，不当忘记方苞。

城古文派之先河；二是在18世纪前期理学渐衰之际，注重从经典考求经义，促进理学学风之变革；三是关注国计民生，讲究学术与经世的结合。所著主要有《春秋通论》、《方苞集》等。

1 参阅苏惇元辑《方苞年谱》（《方苞集》附录一）以及《郎潜纪闻二笔》卷一二，《方侍郎古文》。

2 方苞：《万季野墓表》，《方苞集》卷一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。

3 苏惇元：《方苞年谱》，康熙三十年条，《方苞集》附录一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。

4 方苞：《原集三序》，《方苞集》附录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。

5 方苞：《原集三序》，《方苞集》附录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。

6 方苞：《与万季野先生书》，《方苞集》卷六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。

7 方苞：《再与刘拙修书》，《方苞集》卷六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。

8 苏惇元：《方苞年谱》，乾隆十四年条，《方苞集》附录一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。

乾隆时，曹一士更明确提出改造理学学风的主张。曹一士“少留心于十四经、廿一史，连丝贯串，不徒以章句也。尤潜玩洛闽诸书，旁搜曲证，以求会通。”¹他提出：讲理学必以经书为本，并大声疾呼：“经学之荒，至今日而甚矣！”其《与赵云垂书》对当时束书不观，揣摩迎合之学风大加抨击，企图从整顿士林学风，反对时文流弊入手，重建理学之权威。他说：

夫读书者，必本于经，而经学之荒，至今日而甚矣。弟观于秦汉之间，其时之儒者，取仅存之经而死守之，未敢以闻于人也。迨天子下诏求书，而后或受之女子，或受之田间，或受之狱中，艰难曲折，得以上闻。百年之间，学者虽欲读书而无有也。其后诸儒之说纷然杂出，自汉迄晋以至于唐，彼此异同，迄无定论。是数千年之学者，虽能读而无当也，盖读经之难如此、今则家有是书矣。宋元以来之儒者，亦既著为定论，如日之中天而烛之照夜矣。学者即悉记其文，通其义，譬之陇亩，前之人勤而种之，后之人坐而食之，守成之代较创业者难易何如哉？顾乃束置高阁，视为缓图，日取雷同剿说之时文，童而习之，白首而不倦，以是号于人曰读书。读书者如是已哉？弟曩者亦尝从事于诸经矣，稍稍识其句读，未竟而就有司之试，浮沉泊没以至于今，其为愧恨，无日而忘。盖今者岁科之试，名课诸生以经，而实则荒经之本。学者争为揣摩迎合有司之好恶，而经学不得不为缓图矣。其反是者，文固未必工也，一旦摈于有司，则又不免于得丧荣辱之见，而中道而废者有矣。如士亦稍稍有志者尚不能毕其业于诸经，则他尚何问哉？虽然往者已矣，来者或可勉焉。窃计兄于诸经沉潜者久，必已得其精微，不特记其文，通其

1 全祖望：《曹一士行状》，《碑传集》卷五六，明文书局，1985年。

义而已也。弟俟病之愈将立其本而求助焉。先冀一言已坚其志而慰其求，以副前者相与有成之意，幸甚。¹

曹一士显然试图通过提倡精研经学，恢复道问学传统，以达到重振理学的目的。然而，理学本身是哲理化的学问，片面强调研求经典，用经典取代哲学思辨，显然不切实际，而且也会危害理学自身的独立性和正常发展。故曹一士的主张迂执难行，不可能产生大的影响。18世纪，在理学界真正有较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是朱轼、谢济世、李绂和陈宏谋。

朱轼，生于康熙四年（1665年），卒于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，字若瞻，号可亭，江西高安人，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年）中进士，由庶吉士改授湖北潜江县知县。此后历任刑部主事、陕西学政、通政使、浙江巡抚、左都御史、吏部尚书等职。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，授文华殿大学士，乾隆元年卒于任，谥文端。朱轼为清中叶“理学名儒”，乾隆帝为皇子时，曾任其师傅，“每为阐经旨，汉则称贾、董，宋惟宗五子。恒云不在言，惟在行而已。”²朱轼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见解，对乾隆皇帝产生了重要影响，乾隆帝称：“呜呼！于先生，吾得学之体。”³所著有《朱文端公集》传世。

朱轼在清代被誉为“理学名儒，光辅三朝”⁴。其学“以敬为主，以致知力行为工夫，以经史为法守，以日用为实验”⁵。然其学说最主要的特色是：和一般理学家侈谈天理不同，面对士林阶层对道学家终日谈天说理反感情绪的加强，朱轼治学转而侧重于礼，时人称其“湛深经术，尤邃于礼。酌古今之宜，期可躬

1 曹一士：《与赵云垂书》，《四焉斋文集》卷五，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。

2 《朱轼》，《清史列传》卷一四，明文书局，1986年。

3 《朱轼》，《清史列传》卷一四，明文书局，1986年。

4 朱轼：《吴学濂原序》，《朱文端公集》，古唐朱氏古欢斋藏版。

5 唐鉴：《高安朱先生》，《学案小识》卷四，《清代传记丛刊·学林类》，明文书局，1986年。

行。”¹其学“不言理而言礼”，究其原因，在于朱轼认为理虚而礼实，“儒道宗旨，就世间纲纪伦物上着脚，故由礼入最为切要。”²朱轼认为，实践理学的最好方法就是按礼学的要求“体之于身，验之于心”。“所谓体之于身者，自视听言动日用事物之间，以及伦纪措诸民物，一奉古圣贤之嘉言懿行以为准则，而幽独隐微之地，尤必谨之又谨。凡经书中言存诚、言敬德、言克己慎独、言强恕求仁，一一证之吾心，其有合耶则勉之，否则发愤猛醒，顷刻不敢自安。日以古圣贤所论义理浸灌其心，使欲尽理纯，而后所行不悖于古人，此岂寻章摘句之学所得而比拟耶？”³朱轼这一学术倾向，和宋明以来动以天理为言的传统理学比起来，显然更加务实，也更便于践行，在清代正统理学思潮中可谓别树一帜。

当然，朱轼重视礼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传统伦理秩序，即所谓“先王制礼以顺仁人孝子之情，而不强其所不能。礼制定，而不肖者亦范围于其中，而不敢过。彼较量尊卑疏戚之伦，为世爵世禄计者，由礼教之不明也，礼明而此患息矣。”⁴和一般理学“俗儒”不同，朱轼在宣扬礼教的同时，也高度重视政治和谐，尤其是百姓生计。乾隆初年，清廷进行的一系列政策调整，如政尚宽大，废除雍正时期不得人心之弊政（包括禁革落地税、停止田地丈量与首报、矜慎刑狱等），朱轼可谓首发其端者。尝云：“为政之经，厚生为大；爱民之道，察吏为先。”⁵去世前，特上遗折告诫乾隆帝不要增加税敛。云：“臣查额征所储，于一切经费宽然有余，倘日后有言利之臣倡为加增之说，仰祈圣明乾断，永斥浮言，实为天下苍生之福。至于用人，尤关紧要。邪正公私，心迹各判，几微之际，最

1 张廷玉：《朱轼墓志铭》，《碑传集》卷二二，明文书局，1985年。

2 朱轼：《张子全书序》，《朱文端公集》卷一，古唐朱氏古欢斋藏版。

3 朱轼：《稽古斋文钞序》，《朱文端公集》卷一，古唐朱氏古欢斋藏版。

4 朱轼：《族谱解惑》，《清经世文编》卷五八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。

5 朱轼：《请定考核以专责成疏》，《朱文端公集补》卷一，同治朱氏古欢堂刻本。

易混淆，惟在皇上洞察审择君子小人而进退之，慎之又慎。”¹ 他的这一见解清晰地反映出中国传统儒学，讲究教养并重的思想特色，这和一些庸俗理学家一味强调存理遏欲比起来，显然要高明得多。

如果说朱轼为清中叶正统理学的代表，那么李绂则为陆王之学的中坚。李绂生于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，卒于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，字巨来，号穆堂，江西临川人。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年）中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授编修。雍正时曾任兵部侍郎、直隶总督等职。李绂虽居高位，但不改文人傲气。其《复惠天牧书》充分暴露出他对个人得失荣辱，人主之褒贬好恶并不十分系怀。辞云：

至于位遇遭际，时命为主，庸人皆能侥幸。自君子观之，受恩重则图报愈难，所处高则责备愈众，此可惧不可贺也。来翰所云：汉人翰林，稀任总制。此亦偶然事，存玉堂清话可耳。至于吾辈，以文章功业相期，或出或处，或要地或散局，皆能有所表见，岂屑屑于此乎？²

正是这种文人傲气，注定了李绂不可能获得专制皇帝的赏识，再加上其生性戆直，敢言人所不敢言，故其宦途生涯风波迭起。雍正时，以参劾雍正帝宠臣田文镜，被捕入狱，“两次决囚，命缚公（李绂）与蔡珽同至菜市，两手反接，刀置颈，问：‘此时知田文镜好否？’公奏：‘臣愚，虽死不知田文镜好处。’乃宣旨赦还。”³ 显示出传统知识分子舍身取义，视死如归的宝贵气节。乾隆八年（1743年），李绂以原官致仕，数年后卒于乡。和康乾之时大多数讲理学者专宗程朱不同，李绂“少好陆王之学，不喜朱子”⁴。坚守陆学

1 朱轼：《遗折》，《朱文端公集补》卷二，同治朱氏古欢堂刻本。

2 李绂：《复惠天牧》，《穆堂初稿》卷四一，道光重刻珊城阜祺堂藏版。

3 王炳燮：《李绂》，《国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一二，明文书局，1991年。

4 袁枚：《内阁学士原任直隶总督临川李公传》，《小仓山房续文集》卷二七，《袁枚全集》第2册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。

门墙，不为人言所动，且为其辩护不遗余力。全祖望云：“尝有中州一巨公，自负能昌明朱子之学，一日谓公（李绂）曰：‘陆氏之学非不岸然，特返之吾心，兀兀多未安者，以是知其于圣人之道未合也。’公曰：‘君方总督仓场而进羨余，不知于心安否？是在陆门五尺童子唾之矣。’其人失色而去，终身不复与公接。”¹李绂论学，注重自省，所谓“道心冲淡长有余，眼力纷华都破除”²。尝自述其学道宗旨，“在先立乎其大者”，“吾苟内省不疚，生死且不足动其心，何况祸福？祸福且不足动其心，何况得失？以此处境不难矣。”³身居高位的李绂虽然承认朱子“道问学之功居多”⁴，然出于理学认知差异及门户之见，对程朱之学颇多微辞。其《大学考》云：“至有明之初，本朱子章句为大全，用以取士。士子徒知奉功令，窃科举，耳濡目染于塾师之训，既未尝为《大学》之实学，即汉唐注疏亦束而不观。而孔氏之遗书，世乃不得而知之矣。惟王阳明先生卓然特立，由陆子之言求圣人之学，于是《古本大学》复见于世。”“今天下竟言尊朱，吾亦从而尊之。然朱之前尤有当尊者。阳明先生谓今之学者，重于尊朱而轻于叛孔，盖《古本大学》，孔氏之遗书也。朱当尊矣，孔其可叛乎？吾诚不能重于尊朱，吾实不敢轻于叛孔焉耳。”⁵徐世昌《清儒学案小传》评论李绂之学云：“康熙中叶以后为程朱极盛之时，朝廷之意指，士大夫之趋向，皆定于一尊。穆堂独寻陆王之遗绪，持论无所绌。虽其说较偏，信从者少，要亦申其所见，不害其为伟岸自喜也。”⁶李绂的学术主张在当

1 全祖望：《李绂神道碑》，《碑传集》卷二四，明文书局，1985年。

2 李绂：《送徐澄斋编修南归用少陵送孔巢父韵》，《穆堂初稿》卷一七，道光重刻珊城阜祺堂藏版。

3 全祖望：《李绂神道碑》，《碑传集》卷二四，明文书局，1985年。

4 《李绂》：“绂平日讲学，谓朱子道问学之功居多，陆九渊尊德性之见为卓。上韪其言。”《清史列传》卷一五，明文书局，1986年。

5 李绂：《大学考》，《穆堂初稿》卷一九，道光重刻珊城阜祺堂藏版。

6 徐世昌：《穆堂学案》，《清儒学案小传》卷六，明文书局，1985年。

时受到不少批评。翁方纲尝说：“穆堂之言学，专于行，不事乎知，且如国学之六堂，不程以经书与典籍，而惟日课其起念公私诚伪以为甲乙，此其事可行乎？”¹

附带提一句，李绂虽为理学家，在一般人眼里当属“道德性”一系人物，但学识渊博，颇多卓见。方苞称其“能以文章振发于世”²。崔述谓：“百余年以来，读书有卓识者无过于顾宁人先生，所推为博学者无过于李巨来先生。”³显示出18世纪陆王一系从注重良知向注重学问转变的重要趋势。然也有人认为其“记闻最博，而持论多偏”。比较典型的是在明史馆，李绂曾欲为严嵩翻案，力主严嵩不可入《奸臣传》。可以说开创了当代有人为严嵩鸣冤翻案的先河⁴。李绂尝撰《古文尚书考》，继阎若璩之后进一步论证《古文尚书》为伪，他认为：“《古文尚书》，凡《今文》所无者，如出一手，盖汉、魏人贗作。”李绂指出：“盖安国所得壁中《古文》信有其书，而特非今世所行之《古文尚书》也。司马迁亲问故于安国，而所引之辞绝不类，则今之《古文尚书》，复何所恃以取信于天下也哉？然则《尚书》之所谓可信者，皆其可疑者也。”⁵当然，不能排除李绂论证《古文尚书》为伪，有理学门户之争的动机，因为对《古文尚书》，朱熹“亦尝疑之”，但终以“人心”“道心”数语为宋以来言理学者所宗，故卒尊之而不敢废。然而，不管李绂动机如何，他的有关论述，对稍后崔述作《古文尚书考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朱轼、李绂之学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反映了清盛世时期理

1 翁方纲：《读李穆堂原学论》，《复初斋文集》卷七，商务印书馆，1935年。

2 方苞：《李穆堂文集序》，《方苞集》卷四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。

3 崔述：《集前人论〈尚书〉真伪》，《古文尚书辨伪》卷二，《崔东壁遗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。

4 阮葵生：《李绂为严嵩翻案》，《茶余客话》卷九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。

5 参见崔述：《集前人论〈尚书〉真伪》，《古文尚书辨伪》卷二，《崔东壁遗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。

学传统思潮的大体状况，而谢济世则以理学异端闻名于世。谢济世，生于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年），卒于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，字石霖，号梅庄，广西全州人，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授检讨。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，转御史。有清一代，谢济世以敢于仗义执言著称。为御史时，因参劾河南巡抚田文镜，被雍正帝指责为与李绂等科甲官员串通一气“固结党援”，“捏造丧心昧理之言，参劾田文镜”，交刑部严讯其主使者，谢济世拒不屈服。昭槠记载说：“公（谢济世）昂首曰：‘果有其人。’众讯之。公曰：‘某自幼读孔孟书，知事上以忠荃，即为孔、孟所主使也。’讯者语塞。”¹后被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²。在军营，谢济世仍以其人品学问，颇受尊重，“复有罪守卒，执弟子礼，受四书业者十余人。”³乾隆帝即位后，谢济世被召还，复授御史之职，不久改授湖南督粮道。乾隆九年（1744年），以老病休致。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二月，广西巡抚卫哲治指责谢济世“纵子指官撞骗”，将其“题参革审”，以致谢济世“衰年纍纍”。谢济世于是年四月患病身故。一代名臣，竟然“填死牢户”，结局可谓凄凉。为此，袁枚曾愤怒地斥责卫哲治“奢于刑而俭于德”，称谢济世为“豪杰”，为谢济世抱不平，对其人品予以充分肯定⁴。

雍乾之际，谢济世以直声著天下，为当时屈指可数的著名言官之一。非但如此，其理学思想也别具特色，在清朝理学名家中独树一帜。和其仗义直言的政治风格一样，在学术上，谢济世也

1 昭槠：《谢济世》，《啸亭杂录》卷九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。

2 关于此案，可以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《雍正起居注》五年八月、九月有关内容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。

3 谢济世：《纂言外篇》，《谢梅庄先生遗集》卷七，光绪三十四年全州赵炳麟刻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。

4 参见《齐召南跋齐周华天台山游记案·宋邦绥奏谢济世著有〈梅庄杂著折〉》，《清代三朝史案》中册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，1993年；《答卫大司空书》，《小仓山房文集》卷一六，《袁枚全集》第2册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。

不隐瞒自己的独立见解，“不遵程朱”¹，乃并斥陆王。尝评论近代诸儒云：“（于王守仁）取事功，不取学术，言性言格物谬，且勿论孔孟之教，先博后约。今日致良知，事畔孔孟而废学问也。”又云：“（薛瑄、汤斌、陆陇其）皆笃行君子也，惜未由学问思辨入耳。”而对毛奇龄则颇有好感，称其“博学君子也”，“说四书，说礼，先得我心者多矣。”但同时指出，毛奇龄为《古文尚书》作“冤词”，“皆无足取焉”²。谢济世对陆王的批判，十分尖锐，尝云：“陆子非孔孟之徒也。荡涤事物，完养精神宗曹溪祖达磨也。祖肩二氏，注脚六经，入我室，操我戈矣。”³这种排斥异端的激烈态度，几乎可以和清初熊赐履、陆陇其等人媲美。

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，谢济世向乾隆帝进呈《学庸注疏》，在奏疏中称所著“分章释义，遵古本而不遵程朱”，明确表示自己不辞“诽谤”之罪，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。谢济世要求清廷将学术研究和科举考试区别开来，不可以强制手段限制学术思考，即“习举业者有成规，讲道学者无厉禁”，暴露出明显的要求学术自由的倾向。他说：

遵朱之令始于明洪武十七年甲子乡试。盖明祖起家江北，文公祖籍新安，乡同兼之姓同，故此科定为此令。名虽表彰圣学，实则推崇本朝。然其时习举业者有成规，讲道学者无厉禁，以故卢格著“荷亭”之论，守仁肆“贫鬼”之讥，未有持三尺以法绳之者。况我圣朝安用沿袭前代？……当世道方隆之时，即圣学大明之日，但当发挥孔曾思孟，何必拘泥

1 徐世昌：《谢先生济世》，《清儒学案小传》卷六，明文书局，1985年。

2 谢济世：《纂言外篇》，《谢梅庄先生遗集》卷七，光绪三十四年全州赵炳麟刻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。

3 谢济世：《纂言内篇·诸儒第四》，《谢梅庄先生遗集》卷六，光绪三十四年全州赵炳麟刻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。

周程张朱？¹

谢济世理学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是其性命说。《中庸》谓：“天命之谓性”，宋儒认为命即指性而言。谢济世却将此二字严格区别，另予发明。谓：“有善无恶谓之性，福善祸淫谓之命。性者，天之诗书礼乐，命者，天之斧钺车服也。性善命亦善也，故君子尽性即所以立命。”²其《原性》一文从五行相生的角度论证性善，以五行对应五常，即仁义礼知信，反对宋儒之性命说。云：

天地之大德曰生。木火土金水递生环生，克亦生。人得天地生生之德以为心，而性名焉。其名见于《商书》，其目著于《周易》，而其原出于《河图》。春木曰仁，夏火曰礼，秋金曰义，冬水曰知，中土季土曰信。老氏知有仁义礼知之名，而不知即性中之德，故性则玄之妙之，仁义礼知则绝之弃之；释氏知性中有义知，而不知性中有仁礼，故言戒言慧，义知在言寂言空，仁礼亡。惟圣门言性不可易。以对待言曰仁义礼知，兼对待流行言于信数致意焉。此五者非恶也，故曰继善成性，曰性善，人能率此五者，无过不及，即道也。故不曰率善性之谓道，而曰率性之谓道，人能尽此五者，不思不勉皆中其节，即至诚也。故不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善性，而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。原于有生之初曰天命（命即指性言。宋儒便以此为性命之命，谓在天为命，在人为性，性命二字从此混矣），原于有生之后曰根心。验于感通之际曰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，不可褻曰尊；不可拂曰顺、曰养；

1 谢济世：《进学庸注疏疏》，《谢梅庄先生遗集》卷一，光绪三十四年全州赵炳麟刻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。

2 谢济世：《纂言内篇·原道第一》，《谢梅庄先生遗集》卷六，光绪三十四年全州赵炳麟刻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。